

张春桥同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
三结合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2.24下午

革命文化广场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讨论问题了。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是12日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呼口号）街上有一尔大字报说张春桥到什么地方到北京，那我就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到北京去的。我们12日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毛主席召集了中央的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它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因为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的健康（呼口号）。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关于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快。每一次谈话，对于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问题，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都感觉到这一点，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党中央各尔方面的同志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之关心的，实在使我非常的感动，我们知道，我们两尔人和主席短暂的时间里面，不断的接见我们，却不只是对我们两尔人来说，我们感到是光荣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是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鼓掌，口号）。毛主席对于上海革命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取得的成就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一些，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过去，已经给我们很高的评价。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上海各革命组织所发出来的“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都是毛主席在当时他一看，接到这些文件，他很快就看了，而且就很快决定了向全国广播。在这一次的草案里面，毛主席又说，说上海的工作，总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讲了一些这一段历史，他譬如说，上海的工人，和在安亭事件那尔时候，他讲，上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二千人么，现在已经到达一百万多人了么，工人组织起来已一百万了。那尔么，这就说明上海工人群众好，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毛主席对各尔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各尔方面的情况，白尔方面的情况都问了。机关里的情况，甚至也问了。一些

南渡一部的一些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问到，譬如说，有些细节他都晓得的，譬如他问，他说，你们那个时候不是都到了码头吗？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码头上啊？我们告诉他说，当我们陪卡转回到码头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哟。主席对工人的关心，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的上层的情况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的革命群众的每一个好话，每一个革命的举动，主席都无微不至的关怀，了介。我们主席对上海的关注，更是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来说，对上海革命群众来说，我们上海的人民的极大的关怀，也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极大的支持。（鼓掌，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阶级敌人还会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挡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胜利。我想，下面来分别的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夺权。因为这个问题主席那里谈得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想讲得更多一点，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就是我们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的风暴开始的。（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标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讲，也是介决政权问题，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夺取政权，和一九四九年我们从国民党手里夺取政权是不同的，有它不同的方面。毛主席这一次和我们谈话中间说，他说这一场革命，我们现在的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这一句话，他说，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干出来的，这个革命是我们发动的，这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但亲身领导的。那一天，他是要中央文化小组考虑一下，写一篇文章，就叫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一句话，我想，就我们的理介，在这里介释一下，就是我们的理介哟，主席说，这个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昨天《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里面说了这个意思，这个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着统治地位，不是刘邓路线占着统治地位，这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那么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这个不能说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本主义政权，或者说刘、邓路线是占统治地位，那不能作这样的估计，

所以主席这一句话，简单的来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么后面这句话哟，后面这个又是革命，那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怎么又要革命啊？为什么要革命啊？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他介释了，他说，就是因为我们的团体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辩证法的，他先肯定了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又说搞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哟，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专政中间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这个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它需要革命，（口号）有一个地方提介一个口号叫做“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反动的口号。为什么？因为属于彻底改善，就是，实际上哟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谓彻底改善，那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行了，要彻底的改善了，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个革命又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自己要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这十七年来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哟，觉得我们十七年，中国已经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哟，经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的国家稳定了，统一了，稳定了，而且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它好的方面，但是它带来了问题，就是在这个比较稳定中间，实际上也并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一个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一句话，主席常常是这样，他在很复杂的事物中最后变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场革命的必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介决什么问题，怎么样介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很好的懂得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就能正确的来按照主席的思想来办事。（口号）这是关于夺权里面我想传达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在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级，成为问题的中心的，是三结合。这是能不能夺权，

夺了权能不能巩固的关键。(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对于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已经被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廿二日上海市还有其它四个单位又夺了一次,一月十四日,红军会和其它单位又夺了一次,但是他们夺得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到市委,华东局大印抢到手了,以为这个印拿到手了,权就夺到了,但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你们在座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夺权了,那么他应该可以发号施令了?因为别人不知道的,他的权说是夺了但是他说了话,也没有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的,华东局也是这样,我这里讲的是华东局机关也夺了好几次,但是现在你说夺下来了没有?我看也没有,占了几间房子,有一些人抢跑魏文伯,韩哲一,签个字,要点东西,搞个汽车什么,大概这些夺些,别的东西夺不到,反正我们在上海工作,我们就看不到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我现在劝夺华东局权的人,那个权还是不要夺了吧,要夺,你就搞三结合,你也没有办法三结合,这个将来,我会专门给他们谈,我在中央谈论过了一下华东局这个权,不能这样夺法,书记处的权是不能夺的,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那么,你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了,要夺权,就只能夺华东局机关,华东局机关就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的,我就是讲一个市委和华东局机关,其它单位,同志们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有很多局有些县有些区有些企业工厂夺来夺去,结果谁也没有夺下来,那么这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的,说明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到权的,没有一个大的联合,我们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二个单位或者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下来的,那种夺权是小团体的夺权,或者一个单位二个单位的夺权我说只能产生小团体主义,我们这里有,有的单位夺了什么,夺了印刷厂,夺了印刷厂以后这个印刷厂就给我这个单位了,别人来印东西他就不准,是这样的一一个夺权,我说这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这是全民所有制的,不是属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个人,怎么能够属于你这个小团体呢,如果那样的话,就成为小团体所有制,从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话说得尖锐一点,就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们,这一条路是不能走的,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什么工人自治,小团体,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是这样,我们现在懂了,懂得要大联合夺权,大联合夺权还不能完全说得很清楚,要实行大联合那就关键在他的形式,摆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所

提出来的三结合。(口号)三结合同志们就知道了,就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的代表,这三方面缺少一方都不能算大联合,所以大联合,并不能说有多数的群众团体都参加了,当然应该保持革命的组,那末应该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不只是说群众团体越多越好,还是说,如果缺少了另外二方,没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革命领导干部,那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夺过来,也不巩固,所以主席这一次给我们谈话,谈得最多的就是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地思索了主席的这个指示,也想了想了这个事情,和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在北京碰到山西、山东都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的同志汇报过一天,我们参加了,山东的汇报我们就回来了,我们没能参加,从各个方面看,山西特别明显的,就是军队的作用,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解放军,那就根本夺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省委,山西省委,都反动透顶了,而且已经组织了武装,搞了那么一批保安特务,发了枪,把刘格平同志,就是他们领导夺权的领导同志,原来的副省长,就在他住的房子的对面,就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准了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格平捉起来的。(听不清)不夺权呢?再过两天,这一批领导干部都要被捉起来,是人民解放军坚决地站在革命派的一边,支持革命派夺权,这样子,这些手里一杆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刚才我们念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话,“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是根本不存在的,你又要想夺权,又没有军队,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那就要靠军队打天下,今天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篡夺了的权夺回来,那还要靠军队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

没有领导干部，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这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他只要一采取革命行动他就必须要有干部。那末有人说，一个革命造反派，我们建立一个战斗队，总有一个负责人，不管你叫什么什么，现在人家有的叫服务组，有的叫勤务员，当然有些人不喜欢这个“畏”字，他不乐意叫战斗队的队长。不管你叫什么，总有领导入，总有干部。现在咱们要夺权总要有干部，无非要有新干部，也要有老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承领导工作的，还有这样一些过去担承领导工作的。为什么总有一批担承过领导工作的领导干部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那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里面有很多的贡献，但马上把一个城市，比如象上海市，或者一个苏象江苏省，交给这样的一些工人同志来管理，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么，他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如果管一个车间可能比较熟练，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已经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地，这个困难当然大，这个道理我想用不到多解释的。我总标工作做了几年，现在如果把上海的工作全部交给我，我是感到非常吃力的。我的精力并不是那么样旺，这些……一大堆问题放在我的面前。我过去顶多参加一些讨论么，但决定不是我做决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碰过，没有摸过。如经济工作，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和道一天也不多。象财政、税收这些事，我从参加工作以来，在这里可以坦白的讲，我从来没有兴趣。过去一些文件送到我跟前，我根本不想看。农村我是知道一些，也不多。这车来么，这种感觉，在河成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总觉得虽然我负担很重的责任，同我们的能力不相称，但那时总觉得好办，我到最后问题不好办，就跑去找柯老，同他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办了。柯成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一病倒，六五年去世，那个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这个肩上的担子挑不动了。觉得这付担子突然地向上一加，我那个时候感觉到没有一个地方商量了，担子一加挑不动，同它面临的任务比过去我要重的事要多了。那末一个普通的工人同志、学生，我想他们遇到的困难会比我们还要多。我到主席那边去谈，我们说一个大学生，领导城市，一个市，他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主席那天就说，他要当一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他的学校很复杂，你是在学校里刚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全校情况不了解。主席曾经说，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总总有一身学问么，但是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或者刚有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但是要当个系主任么，总是要能培养一些助教。

呀，讲师呀，原来的一些领导呀，总要这些人出来。我刚才讲的，比如一些老的人，总也不能够都不要。当然，他也说了，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周谷城叫他教书不行了吧，看那些人还行呀？他也关心这个事。主席同我说了这些话，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你们不要浅气呀，主席怎么说了这些话。主席也说，青年人很有希望，特别在文化大革命里面他们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马上要接班，接着委书记、市委书记的这个班，有些困难。这要有一个过程，还没有学习，三结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是老是考虑怎样培养接班人吗，这个班怎样接班？看起来，三结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的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呀，学了几年，七年，八年，十年，现在不过二十来岁，学十年，三十几岁做省委书记，当然很年轻么。所以主席对青年同志从来是热爱的，对青年评价很高，但是现在不能够单强调那一面，因为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三结合，所以就不能不说三结合的必要性，不能不说到我们的青年工人同志、我们的学生同志马上就要接班还是很困难。

拿我们上海的情况来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刚才已经传达了，主席给了很高的估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了三结合，那人民公社的牌子早就被人砸掉了。你们说没有这个危险呀？有这个危险的，因为第二个人民公社，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经在筹备了，他们要砸掉这个牌子。就在外滩人民公社我们办公的地方，警工运的同志们他们都向警备区首长请示，说这块牌子可能要砸怎么办？因为互相推诿不敢去要这个牌子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死命令，谁要砸这个牌子就是反革命，拔起来，如果谁不执行命令再参加了公社的二结合，如果我不是在这里面过高地估计我们的力量，如力量，我们两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是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工作的，有这么一点身分，我们参加了工作。这按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如果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夺市委的权，夺市人委的权就夺不下来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三结合就把权夺下来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三结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今后也是这样，因为三结合的，我下面还要讲，三结合还会继续加以充实，加以提高，但基本力量是三方面代表，这样的基本形式已经形成。我们再加以充实，加以提高，市的革命委员会，它就会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的组织，那就不但是所有的革命组织会起来反对他，咱们人民解放军就会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那这样子，这样的临时权力机关，它就可以形成，是一个有权威的，是有权威的，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机构，现在是有权威的，在将来更加有权威，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总想试一试，想着反对我们，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还想着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他们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了，谁想来碰一碰，我们就会晓得怎么样子对付他们。（呼口号）这一项，我讲的第二项，主要是三结合，这是主席反复谈的一个问题。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革命，怎么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的最好形式是三结合。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革命派，需要夺权的地方，凡是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长的干部是六千多。如果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一个三结合对象，这个不可能，可以找到，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都是处长，我还没有讲科长，科长是更多了，这些人里面，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类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上海的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一直到十二月十八日大会才刚刚开始开了头，这样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好的了。比较先进的，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上海的机关干部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还不是很多，那十二月十八日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依靠革命群众，这应该他们自己负责，谁让你们不造反。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本主义反党路线，还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谁是为首的呢？同时，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的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面有些也没有传达，这样使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又是传达的什么？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在市委常委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能够传达什么？中央工作会议，那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所讲，像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砸打司令部的大学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可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砸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名其妙，怎么砸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应当由领导负责的，在

这由为着的来负责，有些事情，他们根本就没有传达，比如周志的知道的安事那事那事，他们传达谁的指示？传达陶铸的指示。曹荻秋就是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给他讲，就是那种口气吧，春棒么。既然已经承认了么，那就只好这样么，那就继续做工作吧。再把它改过了吧，还不是就是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是执行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对后来主席的意见，虽然没有向一般干下传达，连市委书记处也没有传达。连马天水也都不知道么，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放炮，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谈话时，他们告诉我说，他说他也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的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入他没有这么大的胆量。他一个不知道，而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曾鼓励他到北京啊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什么话都讲。这样的鼓励他，对这种人啊，同志们可以看一看，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人民欠了债，对干下欠了债，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同时他们又拿什么内外有别，组织纪律，什么东西不能讲啊，这样不是把干下都丢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下，特别是领导干下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前面先讲了，首先由他们负责，但是，领导首先应该负责，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的群众，我们相信中间六千多个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干部局长以上的干下，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办法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下，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紧紧跟着毛主席，把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柯庆施同志主持工作这个时期，58、59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吗，还不是这些干下，还不是这些六千多领导干下，还不是六百多干部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刚才念的语录不是要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下，不但要看他们一时一事，而且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也应该看一下这些干下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相对照，就是审查干下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一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跟我们讲，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下，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个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主席他就讲到，这是中国的

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的数量很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搭上一支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只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是要革命的，结果最后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行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下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里边有一页，专门讲了正确的对待干下问题，第四期又专门写了一篇正确的对待干下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都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做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正确对待干下这一篇我们还没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走的那一天，版面送给主席了他看了，若是说重要修改，比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经常在报上经常看到的，有这么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一句话后边这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就是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边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那这样就体现了主席很伟大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是他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错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刚象语录上讲的那样，不是不可救药的都要治病救人，主席加了这几个字，政策界限就很清楚了，那就觉得多了，现在同志们，我已在别的会议上说过好多同志比较忙，特别夺权以后，据说夺权以前羊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没有时间，夺权以后啊马上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呀，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那是要逐字逐句的考虑的吗，因为里边看多是一二个字的变化，政策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发展的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那我们就可能犯错误，这一次谈话的时候毛主席反复地讲了，打倒一切、反对一切这个口号，打倒一切和反对一切这个口号相当的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种思想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中有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是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的一下分同志，这个容易理解了，在文化大革命里边，看了那一些人那，那干硬回劲儿啦，就发生一种错觉，认为大干分都是坏人，那因此说，当别人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道理，其实同志们这个口号只要我们想一想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嘛那干提这个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他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才不打倒一切呢，他还

直没暴露，你怎么能就人家是投机呢，如果弄错了再来再改嘛，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呵，这也就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同志们将来我们就不挂犯错误，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会犯错误的，还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的同志也是会犯错误的，犯错误的我们就改，早改，坚决改，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要我们有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是坚持不改，累教不改，你只要不做这个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嘛，你无非你就不要坚持，不要累教不改，所以我们的时候就错了几个人，不要紧，因为都这样怕，那我们将来自己犯了错误那怎么办，现在我们也不能用了，那么没人做事情了。所以，这个可以请各个单位考虑一下排之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每一个人可以代表那一种类型，咱们有了几个标兵就好办了。刚才讲的都是给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说的了，我们同时希望我们大家要向那些干部做工作，我们也希望他们坚决地站起来，而且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起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有很多顾虑，说：“晓得，早没有站过来”，你既然承认早没有站过来是不对的，那末你现在还不站过来，那不就越来晚了嘛？还等到什么时候呢？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归队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你们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地改，那党还是欢迎的嘛。而且犯了错误了，也有好处，犯了路线错误，那么可能又犯过一次路线错误就增加了免疫力，在以后就少犯路线错误或者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但是现在据我知道的，双方感情过不去，有的同志说，斗嘛已斗了一场了，怎么又去跟他做工作，我们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嘛，有什么不好了，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我们斗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从这一点上，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己应该首先把感情转过，他们绝不能够对革命造反派闹冤仇，挂包袱后账、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一些斗嘛，如果真的接受了教训，那么就on应该更好地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些甚

多过份了，应该谅解，我们对你们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你们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是不能的。小将们有些说的过与的地方，那也只能谅解，任何一个小革命都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这样的一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的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伟大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出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革命，我们付出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啊、夺权和反夺权啊，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现在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是一种代价，我看，有的斗得对，有的斗得有一过之，那么也不过那么一点吧！那么称一称代价吧！就称你对这次革命的贡献好了。老实说，如果要有革命小将们，那么英勇，那么敢想敢说，那么英勇地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不能够抹杀，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象有些人怎么能够掀得出来，能够把上海的百鬼象今天这样的改善啦？不可能的。谁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起码还没有了解这究竟现在的革命是干什么的。我们劝这些人，说你们想一想大体嘛！想一想这一伟大的革命是对我们的国家的前途，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我们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的问题，想一想一些，自己心中有什么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看一看大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要继续搞三结合，我们就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地照毛主席指示办。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出外处内部的人），如果他们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那些犯了错误以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在这样紧要的时刻，考虑一下自己究竟愿意不愿意跟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正错误，是愿意坚持不改，累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再拖延了，我们也请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地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口号略）

下面我想谈“三结合”夺权的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巴讲一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要改名。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作了详细的指示，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我们大家不是都讲搞巴黎公社新政权吗？主席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诞生到现在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他说，根据我看啦，现在也一定是变成资产阶级公社了，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政权形式，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人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现在苏维埃称末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那主席还说什么呢？是君主制他不是肖国王呀，美国是总统制，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他还举了很多例子呢；譬如高越是一总统制，南越的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那是王国，可那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是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一个好一点呢？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好一点，就现在以表现来看，在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是叫王，秦朝叫皇帝，这个秦始皇他把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皇帝；太平天国是叫天王，唐高宗就是武则天的丈夫，他叫天皇，他说你看，这个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看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有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个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字，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晓得多，总统就晓得多，其实在英文里是一样，所以主席说，这个名称啊，不宜改得太多，还有举到历史上去的，王莽、汉朝……王莽（录音不清）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他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制，就象现在我们造反派不喜欢那个“长”啊，都要改了，他就通通改了，把全国的县名，所有县通通改了，主席说，有的象我们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名称都改了差不多。改了以后大家都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那么那个王莽下诏书就是皇帝不命令都困难了，也不知道那个县名都改成叫什么，那么下诏书他就写上，比如说咸阳县南一个县叫咸阳，改成祁酋，诏书里就写上“咸阳暨祁酋”，不，“祁酋暨咸阳”他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得公文来往非常麻烦。主席还讲，话到这种形式外国也可以用，中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它主要的经验就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它也可以设想我们中华人民

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能不改名字。他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那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他都不改。还不这样吗。所以主席提出来他说这个问题主要是靠那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谁掌权，这是个根本的问题，不在名字，所以他说是不是咱们稳当一些好，不要都改名字了。他说有一些出了个问题大家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有的跟我们上海一样也叫了，主席最近这个时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中央的同志也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最初放这方面，如果这样想下去，如果各个省市都叫了人民公社，那末国号就叫什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他说是否要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成人民公社的主席或是叫社长，就出来这个问题了，不但出来这个问题，还出来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要改，那我们就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发生了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这个外国的大使那都作成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主席说这个问题也要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承认，因为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来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好办，资产阶级国家倒可能承认，那末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说如果都叫公社那末党怎么办，党放在那里，因为公社里边有党员有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边有非党员，那末党要放在那里，他总应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公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一个党，一贯道也是一个党嘛，他说公社总得有一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所以毛主席说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他说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要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一个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那么也这样研究，这个大学呀，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十六条规定了嘛，工厂里面过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叫别的，另外我们上海有的叫革命生产委员会了，他们也可叫生产委员会，或者更简单一些叫革命委员会也可以了。工厂的三结合这种委员会也应当是三结合的，应该有干部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当有工人，工人里面不但有青年工人，也应当有老年工人，还应当有民兵，这就是说名称啊，主席的意见是原来规定的宪法上所规定的的一些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

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些都不动了，将来还是叫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嘛，市的还是叫市人民委员会，也不要改嘛，毛主席又说，我们这个上海人哪，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哪，他要我们，你们是不是跟大家去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嘛，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是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他说这个办法的好处嘛，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他们很喜欢这个公社嘛，但是缺点嘛，那就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他说你们不是很孤立吗，他说因为现在嘛，又不能登人民日报，因为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一登上人民日报，全国都是抢着要叫，因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那么这样子改嘛，主席说这个办法就是不改，不改吗，有优点也有缺点，这样的办法那就是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讲的一些就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麻烦，成了很多麻烦事，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恐怕就是改一下，上海改一下，这样子就我们全国就一致了，当然吗，你们可以早一点改也可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不想改老嘛，你们就算一个时期改，主席的基本思想就是怕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他说这个事情你们好好想一想，又要不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找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毛主席对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他总是反复地考虑的，考虑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提出了我们根本没想过的问题，这个不但是我们同志们，恐怕你们也是想也没有想，什么国号问题，什么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根本没有想过这件事，那个时候大家有个什么单位，主张改公社，我们也觉着不错嘛，反正叫公社也可以，以后就干起来了，干起来就干吧，我们也就报告了中央了，我们在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什么想，有的事脑子里转了一下，但是什么叫做社员嘛，……上海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我们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将来怎么解决呀，脑子里想了一想，但也没有很好他想下去，又忙得不得了，脑子里想熟了，但是，主席嘛，他考虑问题反复地考虑，他是非常地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就同意了全国的名称，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当时，中央的文件特别加了一句，“尚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就给上海的革命的人民留了一个余地，说你们上海自己去考虑考虑那末这一句话（鼓掌、口号声）所以，主席在这一些问题上那是考虑得非常周到，非常细密的，特别是对上海群众的感情，当我们临走的时候他说你们看怎么样啊，能不能

说得通啊。我们就说我们上海人民总是听主席的话。主席讲了大概
会听的。(鼓掌、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开了个
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的，没有碰到任何异议，完全同意毛主
席的指示，那末就是中央所对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
我们考虑的结果，还是跟全国一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口号)从今天会议上大家的情绪来看，这更加证明了
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的群众组织，
全上海的革命群众一定会用志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成上海
市革命委员会(鼓掌、口号)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
“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嘛。还有人说什么因为红卫兵没有参加所
以人民日报才没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什么七河八河十河等等，现
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那些问题统统收回去了。(鼓掌、口号)我
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从旧市委
旧市人委的手里转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个事实是任
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鼓掌、口号)有那一个人他在一个会上说
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理由嘛就是这个公
社是少数人搞出来的。更确切一点，我说穿了就是没把他包括在内
(鼓掌)那我们可以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
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力归上海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
确的口号(鼓掌、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就是说它是把一
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
人民也就是说把一切权力从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
夺回到自己手里来了。那末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
权是不用，不会和任何一个人野心家和一个小集团来分享政权的。
他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别人没有资格来讲话(鼓掌、口号)这一阵风
上海人民公社是少部分搞出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是他
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
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
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
好学生，不愧是世界60年代的革命的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
英勇挑起了革命和生产的重担，他们都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
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12月下半月开始。
那么我们的夺权也不是等到成立人民公社委员会才开始，而是从开始
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阻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威胁而市委
在那里继续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使得上海已经陷于瘫痪这样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不夺权啊，同志们，不是说还有一个不夺权
如果从一月初不发表全市人民书，如果不发表紧急通告，那就不要一

个月，我们再有十天，那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敢起来就
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夺权已经那个时候市一级的
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嘛。是一月六号的大会上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
委员会的权力是等于一月革命的成立从组织上由一个组织形式来表
达就是了。正因为是这样子，它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为中
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这个消息他就发现了一个新事物就自下而上
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而才亲自批准了发表上海人民书紧急
通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军委这四个贺电，这样深
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够说它是少数人搞起来的呢。还有人说什么
是我搞起来的，我谢你，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海人
民千百万群众自己起来夺权，谁又能够搞成这样的局面，咱们的同志
有这个的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个革命的革
命的口号。它表达了我们有决心要彻底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提
名字改一下，这个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是用鲜血和生
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鼓掌、口号)有那一个小撮人，人
很少只有那一个小撮，他们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
的思想或者我这样搞还没有说成那什么嘛，至少是搞这一种思想
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什么叫无产阶级
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谁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这个问题上做一
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对你们不要在这上面打什么主意，这上面没有什
么文章好作，在这上面作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鼓掌、口号)

上边主要是讲的夺权问题，后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举三个问
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因为这一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
天报纸上已经发啦，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伙
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以
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文件；
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粮食、保险、整党的文件；
还发了报章的文件嘛。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讨论
发出来的，你算小学开学不开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问上海以前，
12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了好多次座谈会了，广泛的征求意见，征求
小学教师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
月才下决心的，中学也是这样，这些文件里边，什么就红卫工人，
什么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这些文件啊，我想不用像这样
一个一个的解释啦，因为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要讲

地执行。问题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个问题首先是
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把党中央的这些指
示得到贯彻这里边因为今天到会的除了各县到这儿来的同志，但
毕竟到会的农民同志少，她们现在听广播了，不是在这个会场里边
到这个会场里边的是城市里的人多我们希望会上海的同志。当然首
先是贫下中农的同志，他们很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
产”要保证我们今年的农业获得一个好的收成，同时，也希望城市
的同志，要从各个方面支援农业；因为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季节性
性有时候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搞不开
一条，我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反正
我们都要吃饭，那个吃饭成了问题呀，别的事情就难办啦，所以我
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当然，搞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其他的很多
问题也好，都是需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那么在
这里目前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好象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呐，那得
要把时间得放在革命上，就侵占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的很多，用的
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人脱产，好多农村公社
的群众组织闹，一个生产队人不多，但是脱产的人员很多，这是很
不利的，很不好。林彪同志曾经讲过，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那
抓革命呐，应该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按
排，不能够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且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譬如工
厂，你按八小时按排生产，原则的说你这个生产不就打乱了吗？
促生产就没办法促啊，你商店还不只是八小时，农业不是按八小时
工作制的喽，春耕大忙要来啦，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紧接下页）

在这里我想，对于在现在还当在城市里的农村来沪同志讲几句话。
这里面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同志，还有好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
志，他们这一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
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能
很好的学习一下中央的几个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
地去，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
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的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
设好，我们上海再好也没有用。我们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是支援文
农业，支援全国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
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的，我们同志们应该记得，杨文德同志
就是为了关心内地建设才抱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
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那样的关心内地建设，为什么我们不应该
继续这样的。有些人，现在抛弃了自己的光荣的工作岗位，跑到上海
来，有的人跑到上海来要求提干，要尔更重新安排工作，那么达不到
目的，就去斗里弄干部，斗工厂干部，我们以为这是不对的，是
错误。有一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坏事
事，那更是错误的。新疆建设兵团那里，因为内地去的人大量地回到
本地去了，回到上海来了，他们那里的农业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我们
崇明岛，长兴岛一些国营农场，因为有一些青年同志，跑到市内来了，
那里的生产就完全停顿了，有的农场去年种的麦子都没有收，有些棉
花还在地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非常痛心。上海有一些学生同志听
到这个消息也非常痛心，现在已有几千人跑去抗议了。那么为什么现
在原来应该在那个岗位上的人还不应该快些回去的。我们可以听到，
在几个大饭店里面，听说和平饭店，那里就住着一支国营农场的工人，
那么我们就请问一些工人同志，你们住在和平饭店干什么？你们的岗
位是在你们的农场么？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
应该快些回去。而且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它外
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坏人，他们在那里
不让回去。我们的青年同志，革命的工人同志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
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回到自己的光荣的岗位上。现在春耕已经开始
了，应该回去了，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不知道，你这些困难应该
按照正常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手段作借口，就不回去。有些
同志，譬如说在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们也知道
主在北京看到了一些电报，那个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
压迫过你们，那么现在是改变了嘛，贵州现在变成先进地方了么。
那么应该回去，和那里的工人同志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
委员会，去地行革命斗争，也不应该再在上海闹了。有一些人，到

在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天啊名义上是叫做出来造反，实际上出来没
有什么反可造，就是逛大街、玩，我这个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讲
有那么一部分人。我们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是真的支持上海市革命
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由于这样的懒懒散散，不
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是在最困难的后期
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抓革命促生产
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向那些规定。我们赞成贵州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这些人他们这样
的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该加以惩罚，第一就应该如果教育了，功
了，还不回去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领这样的养活养人的
责任不行应该开除，如果再教不好，那就应该受法律处分。我们上
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方向还是会行外动员人口的，所
以想在上海安插工作这个希望，希望不要抱这个希望，没有什么希
望，死了这条心吧。所以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我不想多讲了，就讲这
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我们这样让大家死了心吧，才好
办事，才好活起来。

那么，镇压反革命，这一方面用不着多讲，上海这个地方，同
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关键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
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
只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
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不能粗心大意。现在因为情况很复杂，需
要我们很好的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
现在的情况复杂性，就是由于新反革命，他们如果要是说我是反
革命，这个到好办了。他不是，恰恰有一些是打着反的旗帜，有
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了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那我们全
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
来是毛主席的方针，就是要靠专政机关和人民军队，靠公安局，同
时要靠专政机关和革命人民的结合。就要有充分群众路线，如果，
我们广大的革命的群众都起来了，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样旗号，
用什么方式，或者他们搞秘密也好，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
破他们。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性。第二，希望我们人民
解放军、公安机关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
要全力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
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
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空军，这是我们最可靠的支柱。
在上海的海陆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
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

海的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向人
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攻击你们，如果有人对你们采取
那一种冲击军事机关的行动，我们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人民解
放军站在一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些地方，人民解
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的有个组织，
他们也说自己革命造反派组织，也谈过话，预先谈过话，应该服从
中央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边的当然是
很少的人，居然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画了又
画，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攻，我认为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一个单
位犯过错误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
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我们将要采取别
的措施。我在这里还应该说一点，就是现在市面上谣言很多，这个
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一些人啊，人也不多，但是专门造谣吃
饭。有那么一位，接管市委的，忽然间发来了什么总理的四点指示，
我看那个指示，我说奇怪呵！中央如果有四点指示，应该到我们的
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四条，但是可以假
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说中央、总理的几点指示，但你们问他的
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伯达同
志的，是从那里听来的，居然可以这样，冒充总理的名义，到处去
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这个事，那么就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
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打来了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经过
总参又告新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又恰恰是四点指示，总理好
像专门发四点指示，说什么红革会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不对的，
各打五十板那样子。根本是胡说八道，总理从来没有过这样四点指
示。上海的红卫军还发过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总理讲
毛主席、林彪同志讲，要转业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但是总理
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军都
不好，就是上海的最好。这些东西，本来我们一到上海我们一看
都知道是谣言。这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当成笑料给总理
说了一下，大家就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切头切尾的造谣，毫无一点
影子。还有一些造到我身上来，我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多得我
直没有办法，比如说有一张传单，说我给三军同志谈话，谈话中谈
到三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三军的同志谈话过多
次，但从来没有谈过什么三司。这种谣言多了，又说什么，我们
在北京，突然国务院接得打来电报，说上海一、二、三兵团，二、
三司代表来告状，告上海的工人造反派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
和我，还告我，而这里边说了上海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你们在上海

的，你们知道那一天有过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的，你们知道那一天有过五十万工人大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的吧！这两天又有什么，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什么王力同志会打上海的形势有五真指示，那一真那个时间我们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我现在也不去问王力，也用不到问这回事。还有一个事儿，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上海人民公社如何？所以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同志们：中央文革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鼓舞）在工人劳动文化宫那个地方，北京不是有一个劳动人民文化宫，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一个什么又有几真指示，那更是胡说八道，那里有这些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你怎么又在那里听到什么五真指示，那你真是碰到鬼了。所以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号，就好像说北京有个消息到了上海，在街上一贴，就翻也不缺证据。我们实在是不愿意相信，也不值得相信。如果要相信，也很简单，你可以造谣，我就不能打你电话给总理问一问吗？那样子造谣法，这样的人，以后再造谣，你小心一点，假冒中央、国家政府首脑的名义造谣，你要负法律责任的。（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造谣，靠谣言吃饭是吃不能的，有理你来讲。比如红革会的头头们，你有道理也还是可以来讲，不要靠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们曾经向我们打电话，要求他们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去参加，我说你们战士有什么罪啊，你们请什么罪啊。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那些一小撮头头。就是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的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对之一棍子打死，但是，必须抱着老实态度，不能像采取苏联的女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的战士，使得战士们选择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也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的战士们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昨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他们故意的来挑动革干、军干子女，说现在，什么什么，社会上都到你们父母，这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我们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革干、军干子女绝大多数也是站在毛主席的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口号）他们即使有些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的，你们想着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引到一条错误的道路去，去搞什么串联如何，

你们是得不了的。我们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地来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他们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的父母走的，他们会跟着党走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做这一方面的工作。这样才能使“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不能够在上海扩大活动。最后我想说一下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了，我讲的时间已经相当长了。现在，我们为了执行主席的指示，要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的组织搞得多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那么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谁都看得到的，抹杀不了的。可是，我们还得看到我们有许多问题，我这里讲的是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不是讲的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的队伍里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我们应当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一些组织，需要放宽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因为现在有些革命组织搞行业的很多，比如他又是工人组织，里边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这个很杂。有的学生组织为主，又吸收了别的。有的是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子恐怕不好。还是按照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是按单位来组织也有问题，大家反正都在上边，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在本单位组织，就比较好，坏人不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批判，特别是改，斗、批、改这一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改，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现大联合，那么他们批判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逆反，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好多革命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用协商的方法解决。现在有些单位，有很多行业性质的组织，有的是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比如说有的按年份，那个东西怎么能够造反的，比如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造反司令部，我们劝这样的同志你们考虑一下，那个一九五六年也好，五七年也好，六五年也好，不管那一年吧，反正你那一年总是里面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都是革命的？我不相信。我们要按阶级，要按左、中、右来组织吧。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咱们就按革命造反派来组织。怎么按年份的，五八年，你不管那一年，四九年这个年份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也不能划分阶级啊。有的更是，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是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单位，而且听说，什么东西，一些公署，愤不是都完了吗，当然这些事情应该解决，但

是被挖的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知道造什么反。但是也要经费，又要刻公章，又要搞什么，这些都不成为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就是有一些组织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们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鼓掌）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才讲了，要加以介决。将来还仿效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些组织在市内名义很大，没有几个人，但是也要房子，要汽车，这些人我们希望还是回到原来的岗位，去好好地生产，好好地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的单位搞好，我们也不搞了，我们现在还有好多的单位权还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就是讲组织。第二个还是学习，怎么样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借口忙不有出。同市委的有些领导人不讲话就讲这一套，非把路讲不行，就是不学习，要学习毛主席著作那是难的！什么规定星期六要学习了，到那时候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只靠自觉的。我们同志们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有一句话，希望有些人不要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希望同志们很好的想一想这句话，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但总数不是很多，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这几个人。这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大革命里边，很有才干，但是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就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座的同志们啊，我们自已有没有可能的，我们也有可能刚取得一些胜利就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但这个时候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的方法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的读毛主席的书，不是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念几段语录。真正的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有些主要著作要读，特别已经夺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夺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正读毛主席的书，把我们头脑里的不好的东西，经常的不断地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边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到那个时候另外一批人或者是在座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这个话我想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讲一讲这个话有好处，为了使大家今后不会被打倒，因此今天先讲被打倒。（口号）这一套我们要在学习这一套上，我们要很好的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他花在读书看报的时间占了很大比重，全国出的报纸他都要，而且他都在看，各种专著他都要，每天秘书都是送给他一大迭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了解那么多情况呢？很多的情况是从这儿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这样讲，对我也讲，你们不管怎么忙，你们一天最

好算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能不能拿两个小时啊？（口号）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它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主要是怕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按照毛主席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不断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的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可能坏事就不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有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挥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口号）热烈鼓掌）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里边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完了。

上海市教育局设备处革命造反派
上海革命教育出版社革命造反派印

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六日

这份材料是我们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的，未经张春桥同志审阅，个别字句恐有出入，仅供参考，请勿张贴流传。